

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浙江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与评估

林卡 柳晓青 茅慧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7)

【摘要】根据社会质量理论,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是考察社会质量的基本维度。因此,对社会信任的研究就成为反映社会状况的基本议题。基于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而开展的对当前我国相关群体的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可以揭示当代社会人的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并据此评估社会质量。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社会的社会质量,寻找增进社会信任和提升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政策; 社会信任; 社会质量; 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C 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4-0061-07

一、导言

自迪尔凯姆把“社会团结”作为考察现代社会特征的基本概念之后,“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这些范畴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阐发这些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并把它们用于解释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模式、互动代码和文化价值。在这些研究中,心理学家依照心理学的传统将信任理解为人格特质,并采用一些量表来测量人际信任特质的个体差异;^①经济学家则采用博弈模型来解释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②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机制,并以此来理解人类交互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从这些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所进行的考察,可以反映出一些社会的规范基础也会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和决策的理性基础。

由此,在对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特征的考察中,我们离不开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状况的检验。这些研究可以从个人层面、制度层面以及体制层面展开,并用以反映该社会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规范基础以及人们对社会体系的评判。这种状况也必然反映到用于描述和考察社会制度状况的社会质量理论中。在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该理论把社会团结作为描述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之一,强调社会信任在研究社会质量中的重要性。^{③④}由于社会信任构成了社会体制和人类互动的规范基础,它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赋权程度。因而,通过对于社会信任状态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展示社会的整合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稳固程度。

为了分析社会信任的状况,我们首先要设立分析框架。研究社会信任,应该考虑至少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社会信任的类型可以被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根据卢曼的看法,人际信任是以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建立的情感关联为基础,而制度信任以社会的规范制度、法律法规的制约为基础。^⑤在这一划分中,詹姆斯·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理解人际信任有积极的贡献。在他们的研究中,信任被作为社会资本三要素之一,从而把对社会信任状况的考察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相联系。^⑥与此同时,制度也直接影响人们在相互作用中使用的各种规则、规范、规章、法规,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活动提供基本框架。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信任风险,促进和保证人们行为的确定性、无害性和可靠性。^⑦由此,就制度信任而言,现代

收稿日期: 2010-04-27

作者简介:林卡(1961—),男,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柳晓青,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茅慧,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的支持。

社会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制度信任的发展。

在不同的社会中, 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形成各异的信任类型。彭泗清强调, 在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建构中, 情感的亲疏远近直接决定着人际信任的强弱。^⑧这一特点很早就为韦伯所提及, 在韦伯看来,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由血缘关系所联系起来的亲密的情感基础, 导致了中国人对于家人的极高的信任度; 而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 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⑨当然, 除血缘关系之外, 中国人也会按地缘关系建立起他们的信任链。

在以下的研究中, 我们将分析人们的社会信任的一般状况和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状况。它基于我们在 2009 年夏天进行的社会质量的调查情况的资料展开。在此调查中, 我们从浙江省的一些企业中选取了近 300 个调查样本, 分析他们所反映的状况。

二、调查对象的特征和对社会信任的一般理解

本研究对于调查资料的分析沿三方面展开, 即年龄、收入和居住地。在年龄这个维度上, 我们将调查对象分成三组, 即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这一维度的分析力图反映不同代际之间在社会信任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划分的标准是以“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历史事件为分水岭。青年组指的是小于 32 岁的人, 即出生于 1978 年之后的人群(这一年是改革开放的开始); 中年组设定为出生于 1966 年到 1976 年, 即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群; 老年组包括 44 岁及以上的人, 即出生于 1965 年之前(“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人群。

通过这种划分, 我们得到调查对象的特征如下: 青年组(小于等于 32 岁)占 46%, 中年组(33—43 岁)占 33.2%, 老年组(44 岁及以上)占 18.7%。在国家人口统计数据中, 相应年龄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46.57%(小于 34 岁), 19.46%(34—44 岁), 33.96%(45 岁及以上)。与此相比较, 我们调查对象中的青年组与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的百分比相似, 但中年组所占比例很大, 老年组相对偏小。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人员所导致。

收入状况是我们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纬度。调查对象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组。高收入组的界限定在月薪 4000 元以上。这一收入水平在国家统计数据中是划分界定为最高 10% 的收入人口的标准。低收入的标准为低于 2500 元, 即低于浙江省平均工资线。而中等收入群体位于两者之间(2500—4000 元)。根据调查数据, 有 24.6% 的调查对象处于低收入阶层, 28.8% 的调查对象处于高收入群体, 而中等收入人群占总数的 44.8%。这些数据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 我们也按居住地将被调查对象划分为 4 类: 本地城市人口(25%), 本地农村人口(25%), 外来城市人口(60.4%), 以及外来农村人口(6.3%)。在所调查的 290 个调查样本中, 有 41 个外来员工, 占样本的 14.1%。

在简要描述了调查对象的一般属性之后, 我们进而回顾调查对象对于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问题的一般看法。在对于问题“一般来说, 你认为大部分人可以被信任”抑或“你在与人相处中必须小心提防”的回答中, 45% 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这个数据比王绍光和刘欣在 1998 年进行的调查结果 30% 要高[10], 但比英格哈特的调查结果 50% 要低。另一方面, 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观念同样也可以由一些负面指标来反映, 例如贫困和不公正。在本次调查中, 对于“你是否认为收入差距很大?”这一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98.2%), 雇主和雇员的差距也很大(94.0%)。这种状况无疑会减弱社会信任程度。

在人际信任方面, 调查发现, 人们对处在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人群有着高度信任, 包括对家庭成员和亲戚的信任(89.6%), 对朋友和邻居的信任(分别为 89.5% 及 80.5%)。但对医生的信任度只有 60.3%, 对外国人的信任为 21.4%, 对陌生人只有 9.9%。在制度信任上, 调查对象对公共机构呈现了高度信任, 包括银行(86.9%), 国家行政机关(74.3%), 政党(68.6%), 大众媒体为(60.6%), 而对非政府组织(44.2%)以及对宗教团体(29.2%)的信任程度较低。

三、社会信任和年龄组

社会信任与代际问题紧密联系。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用“70后”,“80后”,“90后”来描述出生于相应年代的人群所具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例如“90后”人群接受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一些后现代思想;相反地,老一代人则有着较强的传统观念,例如孝顺、勤奋、道德和集体主义。由于各代人的成长历程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这就导致了各个年龄组的价值观念会有一些的差异。无疑,这些特点对他们关于社会信任和人类交往本质的观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本次调查中,我们看到,对一般信任的回答,青年组比老年组给予积极回答的比例要高,而认为“与人交往必须小心提防”这种消极态度的比率最低。中年组中则呈现得更加复杂。该年龄组中多于1/4的人(27.5%)给予了“不知道”的回答,说明他们对此问题持难以确定的态度。总的来说,对人们的一般信任程度从青年组到老年组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虽然中年组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例如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青年组比老年组对外国人的信任度更高,而中年组对外国人的谨慎程度要比老年组高。

在人际信任上,我们研究了人们对邻居、医生、政治家和外国人的信任程度。在对邻居的信任上,老年组和中年组对邻居的信任(分别是81.5%和84.4%)要高于青年组(75.9%),而对医生和政治家的信任上都低于青年组。与此相反,对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的信任状况,青年组的信任度最高。这些结果为我们理解中国人际信任的状况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将对于邻居的信任作为人们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的一个指征,我们就可以依人际关系的亲近程度列出一个顺序表。在此顺序中,邻居是与被调查对象最亲近者,外国人和陌生人则相反,可以被看作人际网络之外的群体。而家庭医生和政治家处于二者之间,因为人们对于这些人的信任或不信任是基于他们的职业行为而不是基于私人关系的亲密性。由此,对外来人员的信任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反映一般信任的最好指标。本调查的结果反映,年轻人对私人网络的依赖性较低,因为他们更能接受公共关系和社会网络。老年组对邻居有着最高程度的信任,但对家庭医生、政治家和外国人的信任则呈递减。其他的年龄组有着相似的情况,但相比而言,青年组在三个年龄组中对外国人的信任最高,对邻居的信任度最低。

至于制度信任方面,我们可以以四个机构作为指标,分别是报纸、工会、立法机关和非政府组织。调查反映,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较高。在这些机构中,人们对议会(人大)的信任最高,其次是立法机关和工会。对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最低。而对报刊和媒体的信任度处于公共机构和非公共机构之间。考察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青年组对报社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要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通过比较三个年龄组可以发现,老年组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是三个年龄组中最高的。青年组对报社、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立法机关的信任要相对高于中年组,但对工会、立法机关和法律机构的信任则非常接近。这说明了相对而言,青年组对非政府组织有着非常积极的看法,但是与中年组没有存在显著差异。

作为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进而讨论人们对于社会 and 社区的归属感。这也是反映人们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理念的状态。不同的年龄组在回答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问题上高度同一。回答“非常自豪”和“自豪”两项的人群占很高的比重。同时,在对他们的公民身份的认同感问题上,没有认同感的在青年组中为3.8%,中年组为2.1%,老年组为3.7%,三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地方归属感上,三个年龄组有一定的差别。老年组对于确认当地社团的归属感的问题上比例最高,青年组最低。这反映了青年组对一般团结和社会信任有着总体积极的观点,而老年组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肯定特殊信任的价值,也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的支持。

四、社会信任和收入组

可以认为,人们的社会信任状况也受到他们所具有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为了反映这个状况,我们按照被访对象的收入情况划分了中高低三个收入组。在涉及一般信任问题的回答中,中等收入组给予积极肯定回答的比率最高,高收入组最低。具体地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选择信任他人的比例分别是44.1%和45.5%,而高收入群体中只有35.7%选择信任他人。

对我们调查结果的合理解释可以是,被调查的高收入组中的成员大多是经理、技术人员以及工作中的管理层,因而他们对市场价值有着高度认同。这使他们容易受市场经济的价值的影 响,易于认可“与人相处必须小心提防”的观念。而中等收入组大部分人都 是技术人员,工作较为稳定,不易为市场波动所影响,这使他们能对一般信任持有最高的比例。在人际信任问题上,在三个组中,高收入组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较低,而对外国人的信任在三组中相对较高,其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在三组的比较中也略低。中等

收入组对邻居的信任度最高。而对外国人,三组中低收入组的信任度最低。在三个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对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给出了最低程度的信任,同时他们也对于政治家的信任度最低。

在机构信任方面,76.9%的高收入人群对行政机关表示了信任,而这个比例在中低收入组分别为73.1%和74.3%。这印证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一般印象,即认为在中国威权主义的背景下,高收入人群与政府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的财富所得与当地政府或者政府官员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对司法机构的信任上,高收入组给予“可以信任”的回答为84.6%,中低收入组分别为76.9%和81.6%。与此相对照,高收入组对非政府组织给予的信任度最高(61.5%),中低收入组分别为34.6%和40.3%。他们对工会的信任也不低于中低收入组(分别为69.2%,65.4%和65.5%)。这种状况可能意味着企业中大多数工会与雇主有着友好的联系的情况。在此问题上,低收入组回答“不信任”的占23.8%,比中等收入组的15.4%和高收入组的23.1%要高。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工会与雇主息息相关,而不是雇主或者是资方的对立面。

在有关社会团结意识的强弱问题上,高收入组对当地社区的认同感很强。这或许与高收入组在当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社会权力有关。相反,低收入组对公民身份感高度认同,这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进行的政策努力有关。譬如最低收入保障政策,就为保护低收入群体利益,反对社会排斥和贫困具有现实功效。对问题“你是否愿意为一个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的项目捐献你目前收入的10%?”的回答上,53.8%的高收入组给予了积极回答,中低收入组的比例分别为42.3%和46.6%;与此同时,在对此问题给出否定回答的人群中,高收入组中占38.5%,在中低收入组分别为19.2%和26.2%。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高收入组对“愿意”和“不愿意”的回答都占有较高的比例。这或许反映了这一群体正在把市场价值和社会责任观念相融合、富人团体“社会企业”的责任在不断上升的现状。

五、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按照原居住地划分了两个人群:本地的和外地的员工。在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导致一大群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市场经济的成长,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伴随着第一产业(农业)的没落,造就了1亿多外来务工人员出现在城市中。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有关人们对国家以及地方社区归属感的问题,并假设他们所具有的(或不具有)当地居民的身份会对他们的社会信任状况产生影响。这种状况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参与(或社会排斥)的情况,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群易为城市社会体系排除在外的人群。

在本次调查中,32.5%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大部分人可以信任,而45.0%并不赞同(22.5%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与此相比较,47.0%的本地居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33.0%给出了否定的回答(20.0%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这种情况也在有关归属感和社会团结问题上反映出来。调查显示,68.3%的外地居民对当地社区有着归属感,24.4%的持相反意见(剩余的7.3%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对本地居民来说,83.3%对当地社区有归属感,持相反意见的占10.2%(6.5%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至于对居住城市的归属感,67.5%的外来务工人员表明他们有归属感,22.5%没有归属感(10.0%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在本地居民中,80.2%给出了肯定回答,13.6%给出了否定回答(13.4%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

对于这些有关归属感的调查数据需要展开进一步分析,以往一些人认为,造成外来民工缺乏对其所居住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外来人员所具有的经济保障和收入状况。由于外来人员经常从事一些本地工人不愿意从事的艰苦工作,往往被排除在劳动保障项目之外,而且他们所得到的收入常常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甚至还会出现工资拖欠现象。这就降低了他们融合当地生活的可能性。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外地员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本地员工的现象。例如在低收入组中,72.8%是本地居民,68.3%是外来人员;而在高收入组中,4.5%是本地居民,4.9%是外来人员。这是由于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中,很多都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按照职业划分的调查数字看,本地工人中技术人员只占14.6%,而外地工人中技术人员占89.3%;在管理层中,4.9%是本地职工,而7.3%是外来人员。

但是,这些有比本地人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外地员工,为何仍对当代生活缺乏归属感呢?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是工作环

境的友好程度。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因居住地不同而遭受到歧视的可能性,11.6%的本地居民和45.0%的外来民工选择了该选项。当地社区环境也限制了他们社会活动的空间。比如,在询问他们在校友会和家长会的参与问题上,56.1%的外来员工和39.1%的本地工人未参与这些组织。这反映了外来员工所拥有的社会安全网络相对薄弱,尽管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未参与程度与本地员工的情况基本上比例相同(82%:本地员工82.1%未参与非政府机构,外地员工82.5%未参与非政府机构)。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也会反映在他们的人际信任上。根据调查,外来工人对邻居的人际信任(58.5%相信,34.1%不相信,7.3%不知道)与本地工人(84.5%相信,13.1%不相信,2.4%不知道)相比偏低。由于外来员工缺乏一个有效地当地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所以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较少。这降低了他们的人际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有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外来员工表示信任外国人的比重为29.3%,不信任的占48.8%,未回答的占22.0%;与此相比,本地员工中,信任外国人的占19.8%,不信任的占40.3%,没有回答的占39.9%。相比之下,外来员工对外国人的信任度偏高,对邻居的信任度偏低。

从制度信任上看,在对政治家的信任问题上,只有12.2%的外来员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51.2%给出了否定回答。与此相比较,在当地员工中,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2.8%和44.8%。二者都有1/3的人给出“不知道”回答(分别为33.4%和33.6%)。在对工会的信任上,外来员工中有58.5%表示了信任,34.2%表示了不信任,7.3%回答“不知道”。相应地,本地员工中的数据分别为65.6%,23.8%和11.6%。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从对法律机构(立法机构)的信任上反映出来。外来工人中60.0%表示信任,32.5%表示了不信任,7.5%表示“不知道”,相反,70.3%的本地工人中表示了信任,21.3%和8.4%的本地工人表示“不相信”和“不知道”。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迁移对社会信任的总体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外来员工可能要承受比本地职工更强的环境压力。因此,建立一个对外来员工环境友好的社会,促进本地和外来人员的融合,是一个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任务。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扩张所导致的人口大幅度迁移,往往会对社会信任和团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为什么在一些移民社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程度很低的原因。我们的调查反映出对外来移民来说,当地的环境友好状况比收入因素更为重要。社会要为他们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提供更多的机会。

六、结论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因素对人们的社会信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这一讨论的延伸,我们进而考查在这些因素中,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以上所分析的三组因素中,年龄因素比其他两组因素对个人信任产生的影响力更大,尤其是在对医生和政治家的信任上。对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政府部门的信任也是如此。收入因素在人们对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外国人、非政府组织、报纸以及立法机构的信任的影响程度较大。从居住地的角度看,这个因素对一般信任的状况、对捐献10%的收入的看法和对邻居的信任有着较为强烈的影响,在对法律机构的信任和当地社区的归属感上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由此,如果对这三方面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程度进行总体的评估,数据显示年龄是三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如果我们可以将年龄组因素所导致的差异看作是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收入组因素的影响看作是处在各阶层的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满意程度,而居住地因素反映了社会的融合状况,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就能从总体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的一般状况。

在这项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传统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人们对人际网络的依赖程度很强,但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正受到挑战。这可以通过不同年龄组之间对于一般信任回答的差异反映出来。例如在对于邻居的信任问题上,老年组和中年组都比青年组有着更高的信任,而青年组对邻居的不信任度是最高的。反过来说,对处于个人网络之外的外国人,青年组是三组当中信任程度最高的。这说明一般信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增长。可以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社会信任变化的方向将是一般信任的增强和特殊信任的降低。这种变化归因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开放。同时,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偏低,对邻居的信任要比其他两组更低,而且这一组对外国人、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医生和政治家等人群的信任回答也十分低。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十年里,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增长速度将很快。这个事实将会对人们的一般信任产生实

质性影响。我们需要增进本地和外来人员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社会各群体的相互信任。

这次调查也表明,青年组与中年和老年组在社会价值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同意“我们可以为了公共利益限制个人自由和快乐”的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在对公共机构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对法律机关、工会和立法机构有着更高的信任,而青年组对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的信任要更高。这些改变,说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价值基础来发展社会信任。老年组对公共机构有着高度的信任,与他们所经历的政治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有关。但这种社会背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支持人性解放和个人自由思想。这也影响了他们对公益事务的看法。

此外,社会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可获得性。外来务工人员处于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通常少于本地居民。中年组要比其他两个年龄组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这些具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经常偏爱特殊信任,而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则肯定一般信任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在提高不同人群的社会资本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便增进弱势群体的社会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机构应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以上的讨论表明,使用社会指标来衡量社会信任的程度,可以用于反映社会质量的状况。本研究也表明,研究社会质量最重要的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衡量和比较人们所具有的一般信任的水平,而在于辨识一个社会中所存在的社会信任的类型:是强调一般信任还是注重人际信任或依赖于机构信任的支持。由于在不同的社会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注重点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信任机制。为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系列问题并展开深层次的思考:如何通过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来比较不同社会的社会质量,怎样才算是具有高信任度抑或是低信任度,我们所考察的各社会的社会质量能否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是一个社会中能否拥有不同类型的社会质量,或者是在四个维度的相关研究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成果,以及如何才能在有关社会质量的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中建立一个平衡。这些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社会质量,如何衡量社会质量。在本次研究中,我们看到社会信任的状况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解释人们的社会信任度在不同的代际间所存在的差别,以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

参考文献:

- ① 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 ② 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 ③ 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
- ④ 林卡,高红.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J].社会科学,2010,(3).
- ⑤ 岳璿,田海平.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J].南京社会科学,2004,(6).
- ⑥ 刘斌.信任问题研究述评[J].理论前沿,2004,(4).
- ⑦ 陶芝兰,王欢.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 ⑧ 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社会学研究,1999,(2).
- ⑨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 ⑩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3).